

主编：章开沅 林增平

辛亥革命史

下册

宋庆龄题

辛亥革命史

下册

本册主编：王天奖 刘望龄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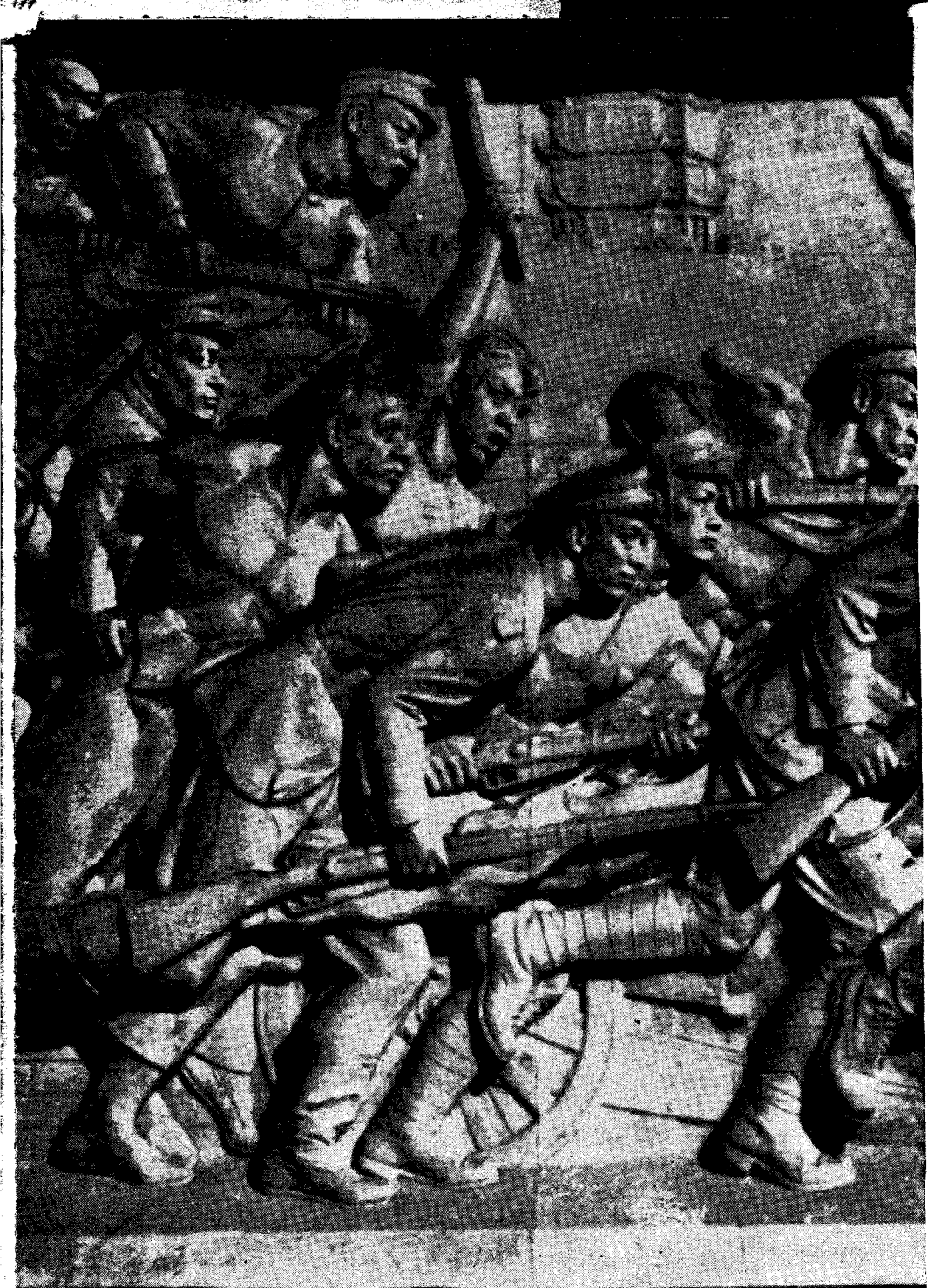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印张 497,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300

书号 11001·442 定价 2.60元





目 录

第十章 武昌首义	1
第一节 首义成功	1
起义的准备	1
起义的胜利	25
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	46
军政府的成立	46
革命政策和《鄂州约法》	65
武汉保卫战	72
第三节 湖北各属的反正	88
黄州、京山、汉川举义	88
宜、荆、施脱离清朝统治	94
鄂北江湖会起义和襄、郧反正	100
第十一章 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108
第一节 各省(区)的起义和独立(上)	108
湘、赣起义	108
秦、晋独立	113
上海、江、浙、皖起义和海军反正	120
两广、福建独立	135
云、贵、川的独立	143
第二节 各省(区)的起义和独立(下)	155
直、鲁、豫革命党人的起义	155

东北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176
西北甘、新各族人民的起义	189
西南少数民族的起义	196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199
第三节 城乡人民的响应和清朝的解体	202
城镇的民主热潮	202
农村的反抗运动	209
清朝统治的解体	215
第十二章 “南北和谈”和南京临时政府	220
第一节 内外反动势力和立宪派人破坏革命的活动	220
帝国主义列强的假中立	220
袁世凯的再起	234
立宪派的破坏和篡夺	241
第二节 围绕“南北和谈”的斗争	251
中外反动派的“打”和“拉”	251
革命内部急剧上涨的妥协逆流	264
“南北和谈”	276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	287
筹建中央政权的激烈斗争	287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296
“革命时代之政府”	306
第十三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	317
第一节 中外反动派加紧内外夹攻	317
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	317
袁世凯的翻云覆雨	328
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活动	335
第二节 革命营垒内部危机的加深	342

与工农关系的恶化·····	342
革命派的分化·····	357
孙中山“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	371
第三节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382
革命派的节节退让·····	382
“逼宫”与“退位”·····	389
孙中山无从改变败局·····	402
第十四章 余波——为挽救共和国而斗争·····	421
第一节 “二次革命”·····	421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421
宋案·····	437
癸丑赣宁之役·····	452
第二节 反洪宪帝制斗争·····	473
洪宪帝制丑剧·····	473
讨袁战争·····	487
护国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505
第三节 护法运动·····	518
张勋复辟·····	518
护法战争·····	537
 附 录	
一 大事年表·····	558
二 主要征引书目·····	580
三 索引·····	599

第 十 章

武 昌 首 义

第一节 首义成功

起 义 的 准 备

辛亥革命是以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的胜利,给了清朝反动统治以致命的一击而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运动的。

这次革命为什么不曾以参加群众较为广泛的丙午萍浏醴之役为扩展的契机?为什么迤邐相属的西南几次起义没有成为革命在全国蔓延的发轫?为什么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枪声不曾作为举国响应的信号?为什么黄花岗英烈们的殊死搏斗没能获致预期的成效?为什么武昌新军的一举反正却导致了首义的胜利和各省的云起风从?这是必须给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武昌革命义旗于首义的次日黎明就飘扬在黄鹤楼上,看来是偶然的。就是当时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也不免感到有些意外。^①然而,这个似乎是偶然的事变,是以历史的必然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那时不曾具备导致推翻清朝的起义获得胜利的客观形势,那末,武昌革命化的新军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首倡义举的巍峨功勋。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82 页。

如同本书第九章所曾叙及，1911年夏季以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动的局势，已日益显露了指顾可待的朕兆。继设置所谓皇族内阁，宣布出卖全国铁路的“干路国有”政策之后，清政府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既断然拒绝立宪派人的请愿；又残暴地压制湘、鄂、川、粤的保路运动；对各处群众自发的反暴政、反苛捐的斗争，依旧是一味地镇压，屠戮，其专横、昏庸、贪婪、卖国的行径，更形昭彰。于是，本来已经激化的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越发尖锐；其他一些次要矛盾，诸如延续二百多年的满、汉矛盾，朝廷专擅集权的皇族亲贵和地方官绅之间的矛盾，迅速露头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都到达非常紧张的地步。而夺路和保路的斗争，又可说是这些主要的、次要的矛盾的焦点。在武昌首义前夕，人民对于清王朝的厌弃情绪，无以复加；一小撮清朝当权集团的处境，空前孤立。在陕西流传着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①的民谣，恰当地反映了1911年夏季以来的形势和群众心头的预感。

但起义首先在武昌爆发这个偶然性，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不应当认为，只要有了革命在全国普遍发展这种必然性，则任何一个类似武昌那样地位的重镇都有可能获致首义的功勋。如同马克思指出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的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②应该看到，尽

① 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0页。

管已经出现革命在全国发动的形势，但如果没有任何一处具有首先发难并获致胜利的条件，则好的形势就可能虚度过去而不成事实，或者是革命因之延缓下来。所以，武昌为什么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是很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概而言之，武昌首义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湖北、武汉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各阶层人民反抗斗争迅猛发展，为首义成功提供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党人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

考察一下 20 世纪初期湖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加深。

控扼长江腹地的湖北，虽然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已被英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但也正是这个时候起，世界列强之间也开始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竞争，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后起的、暴发的德、日、美等国，都竞相打入长江流域，力图从老大的英帝国主义手中分取这块大肥肉。如同 1902 年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奏折上说的：“自近年创兴铁路，武汉为南北枢轴，长江商务日辟，已駉駉直达上游，于是天下大势日趋重于鄂中，各国之宾从络绎，电牒纷纭，几于日不暇给。”^①这反映了湖北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大大加强政治、宗教侵略的同时，还拚命在湖北城乡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霸占路、矿，开设工厂。随着京汉铁路在 20 世纪初的修筑和通车，随着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四处开辟内河轮船运输业，它们经济侵略的触角更深入到湖北内地。

^① 《端忠敏公奏稿》第 2 卷第 26 页。

据统计,1898年汉口对外贸易总额是5千3百万两,到1902年,猛增至1亿两以上,到1910年,即超过1亿5千万两,^①短短的十一、二年内,剧增三倍;其数额仅次于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武汉三镇有各种外国企业180家,其中80%以上都是1900年后建立的。这些怵目惊心的数字,集中地说明了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湖北经济侵略的加剧和加深。

在潮水般涌入的进口和外资工厂出产的商品中,最主要的是与湖北农民、手工工人命运攸关的棉纺织品。长期以来,湖北是盛产棉花的省区,用本地出产棉花纺织而成的土布,是驰名全国的传统手工业产品,陕、川、晋、豫、湘、赣、皖、黔、滇以至苏、粤,都是湖北土布的销售市场。仅陕西一省,19世纪60—70年代时还年销湖北土布值银400万两。土纺织“实为鄂民生计之一大宗。”^②但是,19世纪70—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洋布的大量倾销,而为虎作伥的封建统治者对湖北土布强征“较咸丰初年贵逾一倍”^③的重税,致使湖北土布遭受致命的打击,在外省销路锐减。如陕西“所行之湖北布无人买用”。^④在本省,土纱、土布的命运也相类似。据海关报告,1896年沙市开埠之初,“洋棉纱并无销场”,而到1907年,在这个棉花生产和土纺织十分发达的地区,洋纱转而“销流颇畅”。^⑤另一个包括宜昌、沙市在内的“长江中上游七口岸输入洋纱、国纱净量”的统计表则记载,1894—1898年间输入洋纱净量平均每年211,935担,而到1904—1908年间,则增

① 徐焕斗:《汉口小志》。

② 《粤省停购织布机移鄂筹办折》,《张文襄公全集》第19卷,戊辰北平文华斋刊本。

③ 刘嶽云:《农曹案汇》第3卷第30页。

④ 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第9卷,戊午苏州刊本第6页。

⑤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7—229页。

至平均每年 537,318 担,净增一倍半以上。^① 这样,“鄂民生计之大宗”就被帝国主义所剥夺。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入侵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农民、手工工人“生计”之被剥夺,是在半个多世纪中渐次地进行的话,那么,在湖北,却显得特别急骤,特别酷烈。这次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短时期内遭受打击的灾祸,使得湖北无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急剧地被卷入了殖民主义商品经济的漩涡,坠入了飞速扩大的游民无产者的行列。

更值得提出的,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在湖北所引起的不安和纷扰。19 世纪末叶,因京津、津榆铁路、芦汉铁路芦(沟桥)保(定)段的兴修和通车而造成的大量农民、手工业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及其他小生产者的破产失业,曾经构成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境内迅猛发展的主要社会基础。转入 20 世纪,京汉铁路的通车(光绪三十四年闰四月黄河铁桥建成,全线通车),列强侵略者对粤汉、川汉路权的觊觎和劫夺,则使湖北产生了仿佛 19 世纪末年在直隶出现过的那番情景。

京汉路系比利时银行团贷款兴筑,“其损失利权、事权之故,实以路归借款公司管理,及均分余利、以路抵押三者为要害。”^② 清政府鉴于利权丧失太多,于是设法筹款收回。但又因国库窘乏,仍旧不得不迭向英商汇丰、法商汇理、日商正金等银行借款,作为赎路之用。事实上,无异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路权仍隐然操于外人之手。粤汉路虽经鄂、湘、粤三省绅民力争,于 1905 年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手里赎回,次年准归商办;川汉铁路也早在 1904 年即奏准自办在案,但后来张之洞借口“路长费巨,鄂尤贫困,非借款不能兴工”,^③ 因而不断向外国财团洽商贷款,最后是 1910 年英、法、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131 页。

② 叶恭绰:《遐庵汇稿》第 1 辑上编“公牍”,民国 19 年刊本第 79 页。

德、美达成协议，组成四国银行团揽取了贷款权。这三条铁路干线都通至武汉。铁路兴修给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外国财团纷至沓来地图谋这些铁路的危机，波及的面是很广阔的，众多的劳动群众，新兴的资产阶级人们，爱国的地方士绅，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种事态的威胁和损害。川、鄂、湘、粤连成一片的保路运动的得失成败，也无不在武汉产生影响。帝国主义集中争夺湖北铁路所产生的祸患，无疑是激发武昌首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封建捐税的分外苛重。

清末捐税的繁杂，是和所谓“变法新政”分不开的。“新政”一多，官吏贪污中饱的法门就多，胥役敲诈勒索的手段也多。久在湖北的张之洞是以厉行“新政”而在统治集团中素负“盛名”的，因此，湖北捐税之重，在各省中也就名列前茅。编练新军，张之洞是首倡者之一，他以湖北一省之力，编练了一镇又一混成协，为其他省所不及。^④他所创办的官营厂矿企业数目之多，规模之大；他催令武汉和各府州县开设的军事、实业、师范、普通各方面的新式学校数量之多，用费之大，也是外省所罕有。他如办巡警（仅武昌、汉口两地每年警察费用即需20万两^⑤）、办“自治”等项新政，均属如此。^⑥

③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94页。

④ 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靠的是全国分派协饷，江苏本省亦练成一镇一混成协，官兵总数14,000人左右，比湖北约少2,000人，另清江浦一混成协，系清廷指拨各处协饷练成。

⑤ 瑞澂：《恕斋尚书牍存》“奏牍”第2卷第1页。

⑥ 刘源深：《鄂渚纪闻》：张之洞在鄂，“规画宏大，不惜帑金”，于总督衙门辖下，设置制造、铁政、善后、洋务、商务、筹饷、发审、硝磺、煤矿、火药、土药、川盐、牙厘、膏捐、灯捐、签捐、银元、铜币、官钱、织布、纺纱、缫丝、制麻、校吏、警察、官书、译书、清道、官渡、农务、蚕桑、工艺诸局及营务处，善后局中又分设文案、收发、银库、饷鞘、支领等处及筹捐、报销、军装、军火等所，任用人员“以数千计，皆廩给于公家，所养甚众，”“故鄂之委员多于实任之官十余倍。”（见民国36年南京通志馆编：《南京文献》第7号第4页。）

本来，义和团运动后，湖北已分摊了清廷强派的近 200 万两（包括所谓“补镑”）的赔款，53 万两的练兵费，另又抽收 100 多万元的铁路租股，短时期内又骤加这么多的“新政”开销，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各级反动官府就实行——用张之洞自己的话来说——“竭泽而渔”，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人民的搜刮。除了大幅度地增收地丁、漕折、“耗羨”、盐税、契税外，又创办各种新税，如学堂捐、质当捐、土膏捐、车捐、船捐、门捐、铺捐、签票捐、肉捐、戏捐、赈灾捐、烟酒糖捐、出产货物捐、炭捐、煤捐、柴捐、砖瓦捐、地基捐等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额很大，“有加无已，日不暇给。”^①如学堂捐一项，每地丁银一两，就加收一串三百文，等于是加抽一倍的田赋。另外，又滥铸铜元，滥印钞票。清末全国发行钞票总额约 2 亿元，湖北一省即占三千万元。^②铜元出数之多，亦“为省厂冠”，有时一日铸发至 400 万枚。^③所以，一个多年在鄂、苏等省“当差”的官僚就记述称：“庚子以后，湖北筹款之多，甲于天下。”^④19 世纪 50、60 年代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省内的搜括就已“为天下最”，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张之洞又来一个“甲于天下”，湖北人民的苦难较之他省就尤为深重。加上铜元、钞票泛滥成灾，成了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无形之洪水”。在邻省只要四、五十文一斤的盐，在湖北却“每斤非一百六、七十文不可”。弄得全省到处是“米珠薪桂，民不聊生。”^⑤而地主高利贷者又趁火打劫，加紧兼并土地，增高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率，这就使得大批大批的劳动人民堕入贫困、破产的深渊，连一些中小商人、中小地主也不能幸免。以至武汉市内各

① 刘源深：《鄂渚纪闻》第 18 页。

② 《赵凤昌藏札》第 109 册。

③ 财政部编：《币制汇编》第 2 册，民国 8 年版第 234 页。

④ 姜继襄：《劲草堂笔记》第 99 页。

⑤ 《恕斋尚书牍存》“公牍”第 1 卷第 32、35 页。

阶层人民都“十九咨嗟叹息，谓生理亏耗，输捐日多，衣食均艰，聊生何术？”^①

三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人祸”带来了或助长了严重的天灾。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盘剥，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然灾害十分严重。1909—1911年内，汉江流域上自襄、郢，下迄汉阳、汉川各县，无不遭灾，特别是号称湖北谷仓的江陵、监利、石首、沔阳、潜江、荆门、公安等县，受灾尤重。洪水遍地，田庐淹没，“流亡载途，道殣相望，人至有相食者。愁惨景象，可为痛哭。”^②据1911年9月12日《华中邮报》记述：“1910年6月汉水、长江同时泛滥，武昌城内大多数低洼处被淹，汉阳兵工厂、铁厂、煤矿局、武昌纱厂被迫停产，鄂西、鄂南沿江地区大部分秋粮无收。9月，汉口天主教会报告说，湖北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③仅沔阳一地，饥民即“有五十万之多。”^④成群的灾民涌入早已塞满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城市，造成武汉等城市人口的骤形膨胀。1910年，仅汉口一地，就聚集了20万饥民。其中许多是年富力强的“壮夫”，被迫“三五成群，于居民铺户门前强索硬讨。”^⑤省内城市人满为患，就成群结队地远逃外省，计进入同样遭灾的湖南的湖北饥民就达20万人。^⑥许多人辗转浮海流亡东北，仅在营口登岸者将近万人。^⑦人祸天灾，交相煎逼，使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广大人民再也无法照常生活下

① 刘源深：《鄂渚纪闻》第13页。

② 陈善同：《陈侍御奏稿》第3卷，癸丑河南商务印刷所刊本第14页。

③ F. O. 228/1802。转引自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163.

④⑤ 《恕斋尚书牍存》“公牍”第1卷第60页。

⑥ 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赵伯岩集》第6卷第40页。

⑦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38页。

去了。

社会矛盾的尖锐，必然导致群众自发的反抗相应地激化。20世纪初，湖北如同其他地区一样，人民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反清起义，以及城镇工人罢工、商民罢市等等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在各府州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尤其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相率拥入各城镇，愈益加剧了社会危机。武汉三镇和附近州县除了不时地掀起上述那些群众性的自发骚动外，还日益密迩地爆发了一股新兴势力的运动，即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1907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而罢工。1909年，汉口染业工人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而罢工；丰顺、阜昌、兴泰等外资兴办的茶砖厂八、九千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1910年，汉口湛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工人为反对侮辱和压迫而罢工。此类斗争的频繁发动，更显示了社会矛盾迅速加剧的趋势。特别是1911年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英国侵略者和反动官府的抗暴斗争，更引人注目。这次斗争曾经得到市区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商人罢市停业，新闻界也声罪致讨，并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新罪行。这种登高一呼，万众啸集的情景，实际上已昭示了武汉很有可能成为一场革命风暴的策源地。整个湖北，从城市到乡村，普遍是“民怨且愤”；^①推倒祸国殃民的清王朝，成为各阶层人民一致的要求。“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这首武汉“儿童争唱”的歌谣^②，正反映出湖北革命形势的成熟和人民群众对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热切呼唤与殷切盼待。这就为湖北、武汉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开拓

① 《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58第6页。

② 刘源深：《鄂渚纪闻》第8页。

了良好的形势，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四是比上述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在武汉做了长期的健全组织、积蓄力量的准备工作。

和其他地区相比，武汉革命党人的组织工作的确做得较为踏实，积蓄力量也较为充足。这是和湖北新军数量最多（与各省编练的新军比较，北洋六镇除外），革命党人一直坚持在新军中秘密活动分不开的。

在由各省地方当局自行筹饷编练的新军里，湖北的编练是较为认真的。1905年冬，张之洞就奏称，该省已练成的新军编为两镇，第一镇按章制全部足额，计步队二协四标十二营，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官弁兵夫共12,071名；第二镇，则只步队一协两标，马、炮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官弁兵夫共5,188名。^①次年，经练兵处议复，第一镇编为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称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而湖北革命志士，在建立科学补习所以前，就“俱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②因而相率投入新军充当目兵或低级官佐，秘密开展活动。所以，新军数量较多，就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清末新军所以能供革命党人利用作为倒戈起义的力量，其原因本书第四章（第481—482页）已有所阐述。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性质和湖北新军一样，而数量更多，为什么北洋新军不曾产生象湖北新军那样的变化呢？

首先是因为，北洋新军较早就形成一支军阀武装，而湖北新军则还不具备此种性能。袁世凯从1895年开始在小站督练新建

① 《张文襄公遗集》“奏稿”卷40第14页。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